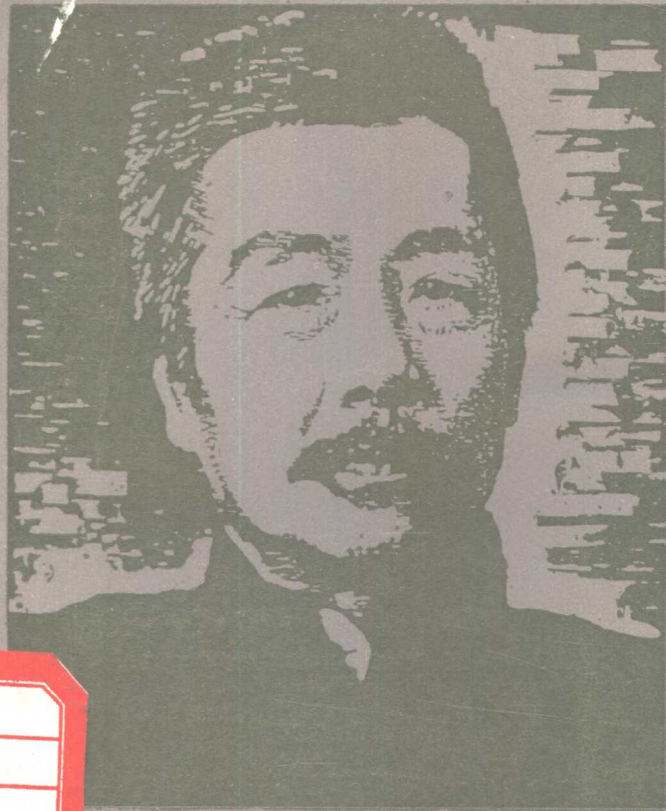




鲁迅文艺思想概述

闵开德

吴同瑞

北京大学出版社

鲁迅文艺思想概述

闵开德 吴同瑞

北京大学出版社

鲁迅文艺思想概述

闵开德 吴同瑞

责任编辑: 宋祥瑞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军事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40千字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册

统一书号: 10209·85 定价: 2.45元1.90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鲁迅前期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认识过程	(5)
第二章 鲁迅论文学的社会作用	(19)
第三章 鲁迅论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及题材问题	(40)
第四章 鲁迅论艺术真实	(59)
第五章 鲁迅论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79)
第六章 鲁迅论阶级社会中的人性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96)
第七章 鲁迅论文学和革命的关系	(122)
第八章 鲁迅论我国文化遗产	(143)
第九章 鲁迅论借鉴外国文学	(168)
第十章 鲁迅论文学创作	(200)
第十一章 鲁迅论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	(232)
第十二章 鲁迅论诗歌、小说、戏剧和杂文	(255)
第十三章 鲁迅论幽默和讽刺	(280)
第十四章 鲁迅的翻译情况和翻译主张	(290)

引 言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生命的价值却可以是无限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并不很长的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他的文艺思想就是这笔巨大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毕生从事文学工作，对文艺的特点和规律有深刻的理解，对文艺的各个方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概括了某些普遍性的东西，含有很多真理，因而对我们今天以至今后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列宁在评论托尔斯泰时曾说：“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要研究这份遗产。”^①这一评价的精神实质在某种意义上也适用于鲁迅。而拿鲁迅和托尔斯泰相比，鲁迅的思想要进步和深刻得多，他们可以说是分属于两个时代和两种思想范畴的人物了。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那个时代，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俄国农民思想和情绪，而在他的思想里还有不少消极的成份，存在着被列宁称为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东西。而鲁迅则不然。他前期（1927年之前）虽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那时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站在时代的前列，许多看法就是正确的和深刻的。鲁迅后期（1927年

① 《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5页。

之后)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看法就更全面更深刻了。所以鲁迅留下的遗产绝大部分是精华,于我们是很有益很有用的。鲁迅文艺思想,是他在毕生文艺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到后期,他的文艺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民族化的,是富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这一总的特点决定了鲁迅文艺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的特色:一、充满了辩证法。鲁迅前期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就含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后期他更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一系列文艺问题。可以这样说,纯熟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是鲁迅达到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曾经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正因为鲁迅的言论、文章和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所以我们在学习鲁迅文艺思想时,就应力求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和把握。只要掌握了辩证法这把钥匙,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二、充满了战斗性。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的一生是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文艺斗争中度过的。鲁迅文艺思想是斗争的产物,是时代的记录,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鲁迅批判了当时各种错误的文艺观点,这首先要肯定是正确的,是有很伟大历史功绩的,就是今天对我们也仍然是很有教益的。可是,历史毕竟又走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情况和鲁迅那个时代是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观点来学习和研究鲁迅文艺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吸取其合理内核,而不能以“句句是真理”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生搬硬套;也不必用今天的情况和尺度去衡量挑剔,故作翻案文章。三、表达的生动性。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善于用形象的语言生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动具体地表达理论思维。鲁迅对文艺问题发表看法时，决不在概念上兜圈子，丝毫没有干巴巴的教条气，而往往是有感而发，一语破的，言简意深，言近旨远，因而需要和值得反复咀嚼，过细体味。四、知识的丰富性。正像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人类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化思想合乎规律的继承、发展和革新一样，鲁迅文艺思想也广泛吸取了中外历史上许多进步文艺思想的养料，并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融为独特的认识，既博大精深，又富有独创性。因而他的文艺思想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那种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广博深邃的智慧学识实在令人叹服。

鲁迅一生写了许多著作，但没有写过一部完备的文艺理论著作。那么，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断定鲁迅文艺思想没有体系呢？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有无系统著作并不是衡量有无理论体系的主要标准。如果不是单从表面形式上看，而是从思想实质上看，那么我们认为衡量某个人的某种思想有无体系，主要应看这样两点：一、他对某个领域的许多问题尤其是重大问题，是否发表过较多的看法；二、他的那些看法，是重复别人的，还是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若以这两条来衡量，那么，鲁迅几乎在文艺的所有问题上都发表过看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讲得尤为深透，而他的看法又有许多新颖独到之处，因而可以认为，鲁迅文艺思想是有体系的。可是，鲁迅在阐述文艺问题时，着眼点并不在于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回答文艺创作和文艺论争中提出的现实问题。对此，冯雪峰曾有中肯的分析，他说：“根据我所得的印象和我的理解，鲁迅先生不愿意称自己为思想家，却愿意看自己为一个战士，我想也是有道理的。自然，在客观上他是一个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因为他的思想是富于创造性的，并且也是有系统的，就是从前期发展到后期，也有一贯的鲜明的道路的。但他的思想的系统性，在他那里是他的从事现实战斗的意志始终如一的

自然结果，并不是他要创造一个思想系统或一个主义的结果。在他那里，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一切真理，不是要拿来砌造自己的学说，而是要用真理之光，来照彻现实和照明前进的道路，要把一切新的和好的思想用到现实的战斗上去。他不是象一个理论家似地常常注意到逻辑的完整性，而是更多地注意实际的用处和更多地受事实的教训所影响。”^①认识到这一特点，就可理解鲁迅文艺思想既有体系和有系统的，但作为理论体系又是比较粗略，不那么完备和详密，而且只是散见于他那浩瀚如海的杂文书信及其他一些著作中。唯其如此，鲁迅文艺思想才需要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

我们怀着进山探宝的心情学习鲁迅文艺思想，并且不揣浅陋，写出一些学习心得。本书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的要求，运用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归纳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地评介鲁迅文艺思想。鲁迅对文艺问题的看法，有些是前后一贯的，有些则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的看法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和深刻的，但有的也有偏颇之处。这些都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实地加以评述。如果本书能对人们全面准确地理解鲁迅文艺思想有所裨益，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笔者深知缺乏那种足以理解鲁迅文艺思想全部精粹的学识才智，书中的缺点错误一定不少，衷心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① 《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页。

第一章 鲁迅前期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认识过程

鲁迅(1881—1936)是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可是,从鲁迅的一生发展来看,他并不是很早就走上文学道路的。他在成年之前和成年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虽然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书,对文学艺术比较爱好,天资聪颖,见解不凡,但是在文学方面似乎并未表现出什么特异的才能,也没有在这方面立下什么宏伟的志愿。他1906年立志搞文学,时年二十六岁;如果从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从而真正开始新文学的战斗生涯算起,则已快四十岁了。

鲁迅童年,是在私塾受的启蒙教育。1898年到南京读书,先进江南水师学堂,后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的是工科。十九世纪末,在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变法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青年鲁迅产生了一种企图依靠科学和工业来救国的思想。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先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一般课程,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学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他那时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学习西方的医学,所以他要学习西医来振兴祖国;二、学成医业,回国救治象他父亲那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鲁迅从小就看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①,在

①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著作版本很多,故本书凡引鲁迅文章中的话,一般只注书名和篇名)。

他少年时期的心灵中就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救国的思想。后来他离开家乡出外求学，无论学工也好，学医也好，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由于他很早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刻想着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所以他青少年时代就对中外的文化思想极为关注，对社会问题有着深沉的思索。在南京时期，他对当时发生的维新运动颇为注意，对严复翻译的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怀有极大的兴趣。到日本后，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鲁迅在去仙台学医之前，就读了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苦苦地思考着怎样改造中国和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问题；而且于1903年就写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译作性小说《斯巴达之魂》，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雨果所作《随见录》中的《哀尘》等。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就可看出鲁迅1906年在仙台医专因“画片事件”而弃医从文，不是偶然的了。他心里装着改造中国的大目标，而又在思想文化尤其是文学方面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因此当受到“画片事件”的刺激，深感医学救治不了中国人的麻木精神时，就毅然决然地弃医从文了。这也就是说，鲁迅本已具备从文的内在因素和条件，“画片事件”只是他转变的一个外因和契机，当这个外在条件一出现，就促使他完成了弃医从文的转化。

关于那次发生在课堂上的“画片事件”，鲁迅自己是这样说的：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

① 《怀亡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鲁迅这些话，把弃医从文的原因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把这些看法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便可看出鲁迅早期思想的某些特点，可以看出他那时思想深刻精到的一面以及某些局限的一面。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汇集日本。鲁迅曾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可是，鲁迅那时的思想又有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地方。那时革命派中相当一部分人主张驱满复汉，他们实际上是搞民族革命。另一些人，虽有民主革命的要求，但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唤起民众、依靠民众的思想。鲁迅则不一样。从他初到日本时向许寿裳谈论的关于怎样改造国民性的思索，到他自述1906年立志从文的动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很早就看到要改变中国社会，首先要改变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要唤醒民众，他的着眼点完全放在人民大众这个基点上。这是鲁迅思想深刻精到的地方，也是他比同时代的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高明的地方。冯雪峰说：“从思想上说，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一

^① 《呐喊·自序》。

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远在他青年时期，他已经抱有别人在‘五四’时期才能抱有的那种思想和见解；这种思想和见解，在他青年时的那个时代，对中国而说，是远远跑到时代的前头去的，他的见解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或思想界权威都来得进步。”^①这些并非溢美之词讲出了青年鲁迅思想上的不凡之处；而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立足于唤起民众和改造社会，就明确地抱定为人生而创作的宗旨，这在那时就是一种比一般人看得深远的“跑到时代的前头去的”思想和见解。

鲁迅早期把文学的社会作用看得很大。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它以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具有艺术感染力，因而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在影响人们思想感情方面有特殊强烈的作用。但是，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文艺毕竟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要从根本上来改革社会，文艺并不是第一位的东西。鲁迅早期对文学社会作用的认识有很深刻的一面，可是他那时把文学看作是改变人们精神的最有力的手段，而改变精神又是“第一要著”；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寄希望于出现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希望依靠文学来振兴中华。这就把文学的社会作用看得过大了，有点文学救国论的意味了。

鲁迅1906年离开仙台到东京，1906至1909这三年间，他在文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鲁迅到东京不久，与几个友人一起准备出版一个文学刊物，取名《新生》；但由于经费和稿源的问题，未能办成。1907年，他用文言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摩罗诗力说》是他所写的第一篇长篇文学论文。这篇文章内容丰富，热情洋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这大概是首次向中国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评介拜伦、雪莱、

^① 《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具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摩罗”诗人。鲁迅写这篇文章的主要意图，是希望中国也能出现像他们那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这种启蒙主义的思想在当时当然是正确和可贵的。但是，文中又说：那些“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在这些话里，以为单靠文学就能救国救民的意思比较明显。1908至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一起译出以欧洲被压迫民族的进步作品为主的《域外小说集》。当1920年上海群益书店重印此书（内容有增）时，鲁迅写了一篇新序^①，开头就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从这里也可看出，鲁迅青年时期对文艺作用的认识，既有正确深刻的一面，又有估计过高的一面。

鲁迅那时为什么把文学的社会作用看得那么大呢？这两个原因。第一，鲁迅当时读了许多外国进步作品，无论从他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说，还是从他对那些作品社会功能的理性认识来说，他都认为文学有很大的激励作用，能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对振兴邦国起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看得很大以至过大。这一思想在《摩罗诗力说》中表现得较明显。第二，是受了当时梁启超等人的有关观点的一些影响。梁启超是戊戌变法前后的著名人物。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就爱看他办的《时务报》。梁启超非常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在1898年发表的第一篇论小说的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以西方和日本诸国为例，把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强调到决定国家命运的程度：“彼美、英、

^①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这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写的”。

见周启明著：《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902年，鲁迅刚到东京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进一步论述小说对改造社会各个方面的决定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要用比较容易普及的小说来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路线服务；他在破除轻视小说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同时，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以至荒谬的程度。梁启超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可以说，强调和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那时已开始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有一批人先后发表了类似的想法。例如，另一位改良主义者陶曾佑在1907年写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中，就有同样的观点：“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法，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陶曾佑对小说社会作用的夸大甚至比梁启超走得更远，他们都企图用小说来改良社会、振兴中华。那时，正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鲁迅，接受这种思潮的某些影响是不难理解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当时的情况是：“梁任公（笔者按：即梁启超）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侧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

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①看来，鲁迅那时对文学社会作用的想法，确是受了梁启超的一些影响，因而把它看得很大以至过大；但他纠正了梁启超忽视文学自身特点和把文学政治化的偏颇，他是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去理解并从事文学工作，主张通过文学自身的特点去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在这些方面他又不同和高出于梁启超。

1909年夏天，鲁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一年后，又到故乡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2月，鲁迅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去南京任教育部部员；5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的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事宜。他从1909年回国到1918年写《狂人日记》之前，这十年间看了大量古书，整理了一些古代文籍和古代美术，这对他以后所从事的小说史研究和文学写作等无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他很少提笔从事文学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基本上中断了他在日本所开始的文学活动。这期间，鲁迅有两件和文艺直接有关的事值得注意：一是1911年创作了一篇取名《怀旧》的小说；再就是1913年写了一篇论述美术的文章，题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1911年冬，鲁迅用浅显的文言写了短篇小说《怀旧》。如果说《斯巴达之魂》是译述性作品，翻译的成份比较多，那么《怀旧》就是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了。它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在私塾教书的封建遗老“秃先生”，在革命风暴面前的种种丑态。这篇小说写于辛亥革命时期，还缺乏“五四”时期才能具有的那种新

① 《关于鲁迅之二》，周启明著《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7页。

的精神特质，因而它不属于新文学的范围。但是，小说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尤可注意的是，“秃先生”既害怕革命、反对革命，又对革命抱投机耍滑的态度，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从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后来《阿Q正传》里赵太爷、钱太爷这类人物的雏形。

1912年，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那时蔡元培提倡美育，在教育部设“夏期讲演会”，还请鲁迅作过美术方面的讲演。1913年初，鲁迅写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发表在当时教育部的刊物上。这里所说的“美术”，按鲁迅自己在文中的解释是：“雕塑，绘画，文章（笔者按：指文学作品），建筑，音乐皆是也。”可见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实际上包括一切文学艺术。《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是鲁迅早期继《摩罗诗力说》之后的又一篇文艺专论，是我们了解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文艺不少精辟的见解。例如，在讲到“何为美术”时说：“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二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谓之作。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可知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这里包含了能动的反映论的朴素见解，并且既讲了思想的重要性，又指出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天物”、“思理”、“美化”，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大体上就是指生活、思想和艺术特性。鲁迅认为文艺是这三者有机的结合，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那就不成其为艺术，这个看法是很正确的。但是，这篇文章所表述的毕竟是鲁迅早期对文艺的一些认识，其中有的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不完全对。具体分析一下，此文

不足之处有这样几点：一、他虽然认为艺术是“天物”、“思理”、“美化”三者之统一，但他对这三者与社会实践的紧密关系以及对实践的依赖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不同社会 and 不同阶级的人对这三个要素有不同的看法也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二、他认为有些工艺美术品，如“刻玉之状为叶”，“象齿方寸，文字千万，核桃一丸，台榭数重”等等，虽似，虽精，但由于不具备艺术的三个要素，主要是不具备“思理”这个要素，“而不得谓之美术”。其实，工艺美术品也是具备那三个要素的，也是含有作者的审美观点即“思理”的，只不过这种艺术样式有自身的特点罢了，所以应该把它归入艺术这个范围之内。三、关于艺术的目的和作用，鲁迅说有“主美”和“主用”之争，他自己认为：“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非常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认为文艺的多种社会功用是通过文艺的审美作用而产生的“副产品”，这有对的一面；但是，他在这里过于强调艺术的审美特性，把审美作用看作文艺的唯一目的，而把其他社会功用只看作是文艺的“不期之成果”，这就不尽妥当了。

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把文学的社会作用看得很大。那么，为什么他在这篇文章中又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把文艺的多种社会功用只看作是文艺的“不期之成果”呢？这两种看法表面看来好象有矛盾，其实恰好体现了鲁迅早期对文艺作用看法的两个方面，他是以自己对文艺作用特有的认识把这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统一在一起的。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也就是青年鲁迅正在成长的时期，中国文化界对文艺的作用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些人大肆鼓吹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提到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地位，梁启超是这种极端倾向的代表。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的代表人